

新马华族文史论丛

陈荣照主编

新社出版



新社学术丛书第五种

新马华族文史论丛

陈荣照主编

新社出版
一九九九年·新加坡

新社学术丛书编审委员会

陈荣照
杨松年
王慷慨
辜美高
凌荣添

新马华族文史论丛

Essays o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主 编：陈荣照
出 版：新社
承 印：人文印务出版企业
总 发 行：新社
Island Society
Pasir Panjang P O Box 34
Singapore 118733
国际书号：ISBN 981-00-2472-X
版 次：1999年3月新加坡第一版
定 价：新加坡币15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本书承蒙
李氏基金
华族文化月新加坡华文书刊展工委会
资助出版，谨致谢忱。

目录

导言：新马华族文史发展的本土化进程	陈荣照	1
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	杨松年	13
战前五年新马华文小说作者之心态	苏卫红	33
新思潮与新文学： 1919至1924年《新国民日报》小说研究	李 志	53
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抗战救亡文学(1937-1942)	郭惠芬	91
丘菽园咏史诗的主题呈现	王志伟	129
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转型期的新马社会经济关系	刘 宏	173
十九世纪末期槟城的娼妓与华人社会	黄贤强	197
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曾 玲	227
《槟城新报》政论量的分析(1895-1911)	王慷慨	251
吴钝民与吉隆坡《益群报》	叶钟铃	269
从《益群报》看英属马来亚的新闻政策	徐艰奋	289

导言：新马华族文史发展的本土化进程

陈荣照*

—

在廿世纪即将结束，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为席卷世界各地的潮流与趋势。全球化所带来的超国界、跨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交往和渗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这股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南亚华族社会中久已存在的本土化进程依然方兴未艾。诚如王赓武教授在分析环球历史与移民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国际化的潮流反而加强了人们，尤其是移民社会，对本土和熟悉的事物的衷情与关注。⁽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也清楚地表明，全球化与本土化并非矛盾的对立面，而是同一历史与现实发展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社会长、南洋学会副会长。

(1) Wang Gungwu, "Migration History: Some Patterns Revisited," in Wang Gungwu (ed),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7), pp. 1-22.

进程中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²⁾

作为现实生活和时代潮流的反映，人文与社会科学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近年来，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都主张摆脱西方或中国中心的解释与理论模式，以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后殖民观”或“本土观”。他们强调，海外华人问题研究应该注重当地的文化脉络以及当地社会环境对华人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影响。⁽³⁾

与此同时，新马本地在近年来所出版的有关论著⁽⁴⁾，也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深入地考察了东南亚华族的形成及演变的历程。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当地华人的文史发展及其融入本土社会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成为当前的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基础。

本论文集的编纂与出版出于双重目的——在深化对新马华族本土化研究的同时，加强本地学者与海外同仁的对话，并试图通过这种对话来加深我们对东南亚华族整体的文化与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识。基于这一考虑，本篇导论将以以下三个方面——新马华族研究中的本土关怀(主题)、研究方

(2) Michael Kearney,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 (1995).

(3) 叶春荣《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兼论一个新的方向》，见《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75卷(1994)；蔡瑞霖《文化交汇的主体性之消解——从世界主义观点到后殖民观点》，见《资料与研究》第25期(1997)。

(4) 例如：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李励图、陈荣照主编《南洋与中国》(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杨松年、王慷慨主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6)。更详细的书目，可参看：魏维贤编《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新加坡：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出版，1990)。

法和理论，以及研究资料——作为侧重点，并将这些论题与本论文集中各篇文章的主题结合，加以讨论。

二

本论集共收入十一篇文章。从学科上讲，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文学史，包括杨松年、苏卫红、郭惠芬、李志和王志伟的论文；其二是社会经济史，包括黄贤强、刘宏和曾玲的文章；其三是文化(尤其是报业)史，包括王慷慨、叶钟铃和徐艰苦的论文。从时间范围上看，这些论文涵盖了过去一个世纪的新马华族文史的发展进程，而侧重点在殖民地时期。从主题上说，它们则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围绕或涉及一个问题，即新马华族文史发展的本土化。诚如曾玲在她的论文中所下的定义，本土化指的是“以移民带来的传统文化为主，同时因应移民所在地的特殊历史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文化变异”。

让我们先来看看新马文学史。杨松年在《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一文中，对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基本问题作了提纲挈领性的分析。他指出，从1919年受中国五四运动影响而产生的新马华文新文学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其成就十分可观，已成为“中国大陆、台湾以外的另一株文坛奇葩。”在回顾了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历程(尤其是方修先生的开创性工作)之后，杨松年认为，到了八十年代，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编写一部新的新马华文文学史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议程。他主张，这一工作应该在“敬重方修，发展方修”的原则下进行，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范围、资料、分期，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

行仔细的重新思考。他的结论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新的新马华文文学史必须“贴切与深入地反映新马华文文学的情形。”

“本土化”的基础是华族移民所带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本土化的起点或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化”的色彩。王志伟的《丘菽园咏史诗的主题呈现》指出，以“星洲寓公”自称的丘氏，虽然人在新加坡，但却心系中国。他通过大量的咏史诗来抒发自己的借古咏今、感时忧国的传统。值得我们注意的不仅仅是丘菽园诗中所包含的一—众多的中国历史典故和浓厚的历史意识，而且也是这些诗中所缺乏的一—对当地历史和人物的描绘。在他的一百二十五首咏史诗中，除了一首写法国皇帝拿破仑之外，其余的全部都是有关中国历史人物与事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新马华族文史发展的本土化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进程；它所经历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与考验是如何重新界定当地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并进而确立自身在新马社会中的定位。

这一定位或认同问题在二、三十代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李志《新思潮与新文学——1919至1924年〈新国民日报〉小说研究》发现，该报具有强烈的中国情怀。它所刊登的小说内容涉及广泛，从儿童题材到改良社会小说，但是这些小说的背景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涉及南洋题材的小说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主要因素是南洋文学作者队伍本身的特点。李志指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当时南洋文坛的形象比喻：“营盘”为南洋文坛，“兵”则是一批又一批来去匆匆的南下作家。这种状况使南洋文学缺乏时间来“积累自身、积淀传统与精髓。”从本土化进程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也

是构成一大障碍。很明显，当人们是以借来的时间，在一块借来的空间上写作时，他们所抒发的并非本土意识。

到了三十年代，新马华族文史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到了这时，随着华人(尤其是女性)人口的大量移入，新马华人社会基本定型并日趋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对南洋本土的关怀逐渐扩大。用杨松年的话来说，1925到1936年是“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然而，特定的时代与历史背景使这种文学上的本土化进程受到暂时的挫折。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海外全体华人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意识空前高涨，这也直接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苏卫红《战前五年新马华文小说作者之心态》表明1937-1942年是“本地意识”与“侨民心态”共存的时期，而后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的马华文学作者群(包括南来作家)的中国情结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落叶归根”心态及其社会责任感。而本土作家(包括少数南下作家)则以主人翁心态，开始在其作品中注入新马社会现实的内涵。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抗战救亡文学(1937-1942)》主要关注的是南来作者与新马抗战救亡文学的关系。她指出，这批作家以抗战文学作为救亡武器，通过“纸弹配合子弹”的方式，不仅宣传了抗日的主题，同时也以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形式，强调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些作家一再呼吁“南洋地方性”的重要性。例如张楚琨就认为，“我们生活在南洋，应该以南洋现实为题材。”这也表明，即使在华侨爱国主义顶峰的时期，本地意识(或南洋心态)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事例也提醒我们，本土化的进程并非一种单纯的线性发展；它可能受到时代背景和作家本身心态的影响，而出现徘徊与曲折。然而，这一进程的终极目标却是十

分明确的，那就是，通过创造性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地人文脉络，培育发展出具有南洋色彩的本土华族文化。这一漫长的文学本土化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加速展开，出现了杨松年所指出的“本地意识的拓展和腾涨时期”，并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具有自身特点新马华文文学。

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艺术之镜，历史学则是现实的直接写照。本论文集中的三篇有关论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涉及了新马华族本土化的进程与特征。曾玲《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以1871年建立的碧山亭为例，探讨华族移民所带来的传统文化是如何结合新加坡的特殊历史环境，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具有本土色彩的文化与社会型态。她认为，作为一个跨地域 / 方言的组织，广惠肇碧山亭的建立与发展是新加坡帮权结构的一个缩影。由于民间宗教对移民时代的新华社会具有整合社群的作用，小群体(广府人与客家人)通过建立共同的崇拜对象(福德正神)，进而建立新的联合阵线，以确保自身在帮权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广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因而达到了“既容纳小群，又整合大群”的目的。曾玲指出，这种跨地域与跨方言的社会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个案研究清楚地表明，新马华族的本土化不仅仅是环境使然，而且也是华族移民的主动选择；他们将本土化作为适应新环境的一种有效策略。

黄贤强《十九世纪末期槟城的娼妓与华人社会》着重探讨槟城妇女，尤其是娼妓的社会史。这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过去经常受到忽视。正如他指出的，通过对与妓女生活有关的人和事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种族关系，从而再现新马早期华族历史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作者在参阅了当时的报刊资料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十

九世纪末期槟城的娼妓业的兴起是当时众多的单身男性劳工移民南来的直接后果。多数的妓女是在中国被拐骗或被贩卖到槟城的。她们不仅生活十分悲惨，而且受到私会党的严格控制；尽管英国殖民政府有时也会插手当地红灯区的纠纷。黄贤强还进一步分析了十九世纪槟城方言帮派之间的互动关系；当地的男性多为闽籍，而妓女则多来自广东省。因此，“嫖妓卖淫虽然是社会病态，却是当时少数突破方言帮派隔阂的华人活动之一”。这一个案分析以及一些其他有关著作(如Carl Trocki对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与鸦片贸易之关系的研究⁽⁵⁾)提醒我们，通过对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团体或行业的微观考察，有助于厘清新马华族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宏观进程。

刘宏《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转型期的新马社会经济关系》是本文集中唯一一篇专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马华族史的论文。到了五十年代，随着东南亚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国大陆局势的变化，当地华人的认同对象已逐渐地转向他们的居住国，从而迈入了华族文史发展本土化历程的一个分水岭。刘宏的文章以战后初期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组织”(美国学者施坚雅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例，探讨它如何通过种族与人际关系渠道，协助新加坡渡过建国初期的困难阶段。该组织还进一步将新马之间的双向交往桥梁扩大、建立了区域性和全

(5)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有关这类社会史著作的评论，参看：James F. Warren, “Review Essay: Capitalism and Addiction——the Chinese, Revenue Farming, and Opium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Java, 1800-1900”,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7, No. 1 (1995), pp. 59-72.

球性的多边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与服务对象是东南亚华族社群。尽管中国仍然成为影响华族文史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已不同于二战前那种主导地位，而是一个辅助因素。

本论文集还收入了三篇从文化史、尤其是报业史的角度来分析新马华族发展的论文。王慷慨《〈槟城新报〉政论量的分析(1895-1911)》的研究对象是政论，亦即“评论时政的一切论文”。他对1895-1911年《槟城新报》政论的分析显示，这期间报界与文化人之中具有强烈的中国情结，这不仅从报刊中所体现的内容和思想倾向中可见，而且也反映在报刊文体之上。例如，上谕与奏摺是政论中的两个种类，虽然它们只占所有政论的百分之十五，但是，这类新闻文体则是清朝(或中国)影响的鲜明表现。再则，该报所转载的外稿中，绝大部分来自上海和香港等地的报刊。

叶钟铃《吴钝民与吉隆坡益群报》一文指出吴钝民联合一群爱国志士创办《益群报》、“以启民智，促进教育，培植社会道德，发展民生事业为宗旨。”自《益群报》于1919年3月24日创刊以来，吴钝民即任编辑主任，主持该报笔政，直至7月29日被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总共在报社服务四个多月，使该报成为“联邦华人文化之机关，社会之晨钟”。他响应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召，发表激烈的爱国救亡言论，并号召华人展开抵制日货运动、成为二十年代新马左翼政治运动的先驱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马华族文史的发展受到英国殖民当局有关政策的直接影响。徐艰奋《从〈益群报〉看英属马来亚的新闻政策》通过讨论该报所报道的新闻事实以及它本身的遭遇，进而透视英国在马来亚所实行的新闻政策的内涵。

她发现，在1919年之前，英国殖民当局并没有一套系统而具体的新闻政策，这种放任态度使马来亚的华文报业得以迅速发展。这也给《益群报》提供了相对的自由空间。它通过鼓吹反专制的言论以及宣传民主和科学，表达了该报“热爱中国”的立场。但是1919年之后，英国殖民当局态度发生变化。随着华人民族主义运动和反日抗议活动的勃兴，使英国殖民当局担心社会与经济秩序受到破坏，自身的利益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它对马来亚的新闻界设制了诸多限制，不允许过多宣传华人民族主义和中国情结。这也直接导致《益群报》在办报方针上进行了调整。徐艰奋斗认为，英国殖民政府的政策是有限度的自由，其宗旨在于维护它在英属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三

前面我们介绍了本论文集的主要内容，并强调其中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新马华族文史发展的本土化进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与研究资料、理论、方法有关的一些问题。

本土化研究所注重的是中国传统在移入新环境之后所发生的变迁与传承。要确切地反映这种进程，我们必须采用体现本土观念与当地意识的资料。本论文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文献资料的使用上，所有的作者都有意识地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他们分析的依据，这因而有助于得出较深入而客观的结论。例如，有关文学史和报业史的论文都取材于二战前新马华文报刊及其文艺副刊。曾玲的文章参阅了不少碑铭资料；黄贤强的论文资料来源于槟城华文报纸的议论文章及新闻报道；刘宏则采用中华总商会的会议记录，并辅以

同有关当事人的个人访谈资料；徐艰在讨论英国殖民政府的新闻政策时，还参考了殖民地官方档案文献。

本土化理论的产生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新现象；以华文撰写的有关理论书籍最先是在台湾出现。⁽⁶⁾迄今为止，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尚未对这一理论进行过直接而系统的阐述。从1945年至今，海外华人研究中佔主导地位的思潮是“中华文化持续论”（五十年代），“华人同化论”（六、七十年代），“多元认同论”（八十年代至今）。⁽⁷⁾即使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中颇为流行的“现代华人跨国活动”理论（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其重心还是在于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对于海外华人的本土化的起源、进程、及其特征还缺乏理论性的建构。⁽⁸⁾由于这一总体的理论论说（Discourse）的不足，本论文集也无法有的放矢地针对本土化理论的内涵与层次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不过，一些作者还是尝试将他们的个案与有关的理论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例如，杨松年的文章涉及到马华文学史撰写中的基本理论构架问题；曾玲将广惠肇碧山亭的个案放在本土化理论的框架之下加以描述；刘宏的论文则注意到传统的华人社会组织如何被重建成为区域性和世界性的华商网络的基础。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本文集的论文大多采用传统的文史分析法，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归纳和论证。尽管一些

(6) 参看：陈其南《土著化与内地化：论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发展模式》，见《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90），页335-366。

(7) 参看：丘立本《东南亚华人研究中学术思潮的演变》，见《南洋学报》第45/46卷（1990/1991）。

(8)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ed.),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7).

作者也注意到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这些方法在新马华族文史研究中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我们希望本论文集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仅使更多人意识到东南亚华族文史发展的本土化趋势，而且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进行宏观阐述。

四

国际化不仅造成生产的全球性大分工，也导致空前规模的人口迁徙与流动。从本论文集作者的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化影响的一个侧面。他们之中既有新马本土出生、成长，并游学东西方的学者，也包括那些生于大陆，然后在中国、新加坡、北美和日本受教育的学人。他们这种广泛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有助于从不同的视野与个人感受来观察和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这些作者中有些已经辛勤耕耘数十载，已成为有关领域的权威；更多的则是新近跨入新马华族问题研究的新人。大家对新马华族文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并愿意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鼓励更多的人加入研究中国和东南亚华人语言、文化、历史和哲学的行列，是新加坡新社从1966年创立以来的一贯宗旨。过去三十多年来，本社除了先后出版《新社学报》、《新社季刊》、《新社文艺》之外，还主编出版了《新社学术丛书》、《新社学术论文集》、《新社文艺丛书》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等。⁽⁹⁾

(9) 有关新社的成立及其早期历史，以及它在1966-1978年间的出版物目录，参看：翁世华(Ong Tee Wah), “The Island Society, Singapo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见《新社学术论文集》第一辑(1978)，pp. 65-114。

这些出版物对新马华族文史研究特别关注，本文集的出版也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我们衷心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得到本社同仁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鼓励，在深化与普及东南亚华族研究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